

论宋濂晚年的文章书写与政治关怀 ——以其进入金陵后所作的馆阁之文为中心

朱光明

摘 要: 宋濂是明代古文大家,被朱元璋誉为“开国文臣之首”,开有明一代文章气象,在元明古文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元明易代,因“时”“遇”发生变化,宋濂努力寻求机会实现儒者之理想。朱明定鼎金陵,宋濂受知于朱元璋。金陵历史文化厚重,宋濂在此深受庙堂文化濡染,创作了大量关涉金陵风物及明朝制度建构的馆阁之文。进入金陵后,其文章风格由山林逐渐转变为馆阁。文章书写所传达的褒“台阁”、贬“山林”的转变,折射出其建构一代明文正宗的政治文化理想。总体来看,宋濂的馆阁之文呈现出文道并重的特色,表达了希望朱元璋能够实现仁政理想的政治关怀。同时,宋濂入明后馆阁文章的创作,开启明代台阁体的先声,更为有明一代文章的演进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 宋濂; 政治关怀; 文章书写; 金陵

作者简介: 朱光明,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3969/j.issn.2095-042X.2017.02.013

宋濂(1310—1381),字景濂,号潜溪,金华浦江人。幼家贫,好学强记,先后师从闻人梦吉、吴莱、柳贯、黄溍诸儒,被推为一代明文“正宗”,朱元璋誉之为“开国文臣之首”,著有《宋学士全集》。学界对宋濂的研究多集中在理学、史学方面,而疏略于对其馆阁之文的探讨。馆阁文章在宋濂现存文章中占据很大的比例,并且金陵在宋濂的一生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某种程度上讲,其人生的辉煌在此开始,又在此走向终点。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对宋濂在进入金陵后创作的馆阁之文进行考察,以更好地了解、认识其文学创作风貌,进而体察其晚年的政治关怀,同时有助于了解洪武文坛士子的心态。

一、进入金陵前的悠游山林与白云樵唱

宋濂的文章书写,以元至正二十年(1360)入金陵为界,可大致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在进入金陵前的五十年,宋濂大部分时间生活在浦江,在东明精舍课馆授徒,寄托心志于山水之间,著有《浦阳人物记》《潜溪集》《萝山集》等,这一时期的文章主要收录在《潜溪集》中。此一时期,宋濂的文风主要如下:

(一) 存传古意,发为山林之音。宋濂在其四十六岁的时候,作自传《白牛生传》,较好地展现了他的形象:

好著屐登山,遇境胜处,注目视弗释。或恶其癖,生曰:“吾与峦容川色见三代之精华,不忍舍也。”生年四十有六,发无白者,日坐一室中,澄思终日。或执笔立言,

动以圣贤自期,其中之所存者,人固莫能识也。^{[1]295}

游览越中山水,研读诸家经典,是宋濂的两大乐事。与山川林壑为友,置身于清幽的环境之中,宋濂下笔为文,辄多清丽可喜的山水游记。浦江西边的五泄山是处在婺、杭、越三州交界之处的名山,山水以奇峭闻名。《五泄山水志》描绘了宋濂登山所见的情景:“又行三十步,榛篠成林,翠光浮映,衣袂成碧色……至此则气象阴幽,绝不类人世,如升蓬峤,坐水晶宫,生平烟火气尽消”^{[1]1749},如此幽奇的景色,令宋濂感慨不已。

作于元至正十六年(1356)的《桃花涧修禊诗序》则把浦江城北的桃花涧的泉石之胜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如描写飞雨洞:“又四十步,从山趾斗折入涧底,水汇为潭。潭左列石为坐,如半月。其上危严墙峙,飞泉中泻,遇石,角激之,泉怒跃起一二丈,细沫散潭中,点点成晕,真若飞雨之骤至。仰见青天镜净,始悟为泉,曰飞雨洞”^{[1]432};山水胜景让人欣然陶醉其间,在宋濂的笔下,参加修禊的友人更是展现出了丰富的神情姿态,“或闭目潜思;或拄颊上视霄汉;或与连席者耳语不休;或运笔如风雨,且书且歌;或按纸伏崖石下,欲写复止,或句有未当,搔首蹙额向人;或口吻作秋虫吟;或群聚兰坡,夺觚争先;或持卷授邻坐者观,曲肱看云而卧,皆一一可画”^{[1]432}。从修禊这样的日常生活里,我们可以看到此时的宋濂很重视抒发个体的情怀,描写生活的具体情境,细致入微,妙趣横生。

宋濂比较注重主体内心的自由,强调“心”的作用。在《贞一道院记》中,他认为:“心则神之所舍,无大不包,无小不涵,虽以天地之高厚,日月之照临,鬼神幽远,举有不能外者。故其精诚所召,挥戈指天,白日退舍;拔刀斫山,飞泉涌地,亦感应之常理耳,何足异乎?”^{[1]81}上述认识,无疑影响着宋濂的文学创作。

(二)平淡自然,寄托深远。宋濂不求闻达,虽生活于草莱之间,亦快然自足。王祹《宋潜溪先生文集序》谈到宋濂此一时期的文风为“富而不侈,核而不凿,纵横下上,靡不如意”^{[1]2720},并言及其境遇:“景濂既不求用于世,而世亦未有以用之”^{[1]2721}。由王祹作序的《潜溪集》刊刻于元至正十五年(1355)。而在元至正九年(1349),宋濂曾受荐擢为翰林国史院编修官,宋濂予以婉拒。在这个阶段,朝廷并非没有给予其施展才华的平台,其中很大的原因可能是此时的宋濂无意于仕途。在王祹看来,这是因为“景濂素不嗜进,固辞避不肯就”^{[2]443}。作为同门兼知音的王祹,对宋濂此际的处境是有着深刻印象的。王祹作《宋太史传》记载了此一时期的宋濂形象:

性疏旷,不喜事检饬,宾客不至,则累日不整冠。或携友生徜徉梅花间,索笑竟日;或独卧长林下,看晴雪堕松顶,云出没岩扉间,悠然以自乐。世俗生产作业之事,皆不暇顾,而笃于伦品,处父子兄弟夫妇间,尽其道。^{[2]444}

在王祹的笔下,宋濂山林之士的形象,跃然纸上,栩栩如生。正如王祹描述的“会世乱,益韬闭,不欲事表显”^{[2]443}。宋濂采取的行动是入小龙门山闭门著书,共著有《龙门子凝道记》二十四篇,“又著《孝经新说》、《周礼集注》等书,皆传于学者”^{[2]443}。如果说骑着白牛的“白牛生”能代表宋濂在现实生活中的形象的话,那么“龙门子”颇能代表其此一时期的“精神形象”。他的不少想法亦是借“龙门子”之口讲出来的,如“君子之任道也,用则行,舍则藏”^{[1]2179},同时谈到“古之人非乐隐也,隐盖不得已也”^{[1]2231},从历史中找到了伊尹、傅说、太公望等知音,渴望自己也能向他们一样,“自任天下之重”,建立一番功业。在此书中,宋濂流露出了一定的人世精神。他在《龙门子凝道记》卷后谈到归隐原因为“龙门子道不行于时,乃退隐小龙门山中”^{[1]2237}。

行笔至此，不得不提《龙门子凝道记》的成书时间，即始于元至正十六年（1356）冬十月四日，完成于至正十七年（1357）春正月一日，夏四月五日，俾仲子璲重录成编，厘为上、中、下三卷^①。之所以提到这个时间节点，是因为在元至正十六年（1356）的三月，朱元璋攻克金陵；至正十七年（1357）三月，朱元璋攻克常州、扬州、徽州等地。元至正十七年（1357）夏五月，宋濂作《燕书》四十篇，以寓言的形式表明心志。在《燕书》的开篇，宋濂便谈到：“玄黄之间，事变无垠。辩士设喻，以风以陈。质往旧，开今新，作《燕书》四十首”。此书的“开今新”究竟指的是什么？宋濂没有明说，然而在每则故事后“君子曰”的评论里却道出了他的真实想法。如在《中山君嬖梁其生》故事的结尾，有表达对君王不察的感悟：“世道既污，以佞为贤，以正直为儉邪者，皆是也。尚何暇中山君之笑哉，尚何暇中山君之笑哉！”^{[1]2291}在《鲁之父老相与谋造狐白之裘》故事的结尾，有表达对明君的热烈歌颂：“鲁之父老何其善爱君哉，其气和，其辞婉以周，其情恳愿而有依。鲁君应之，若黄钟大吕，弦歌干扬。洋洋乎相宣，泠泠乎相应也。君臣如此，鲁欲不治得乎？《礼》曰：‘无体之礼，上下和同’，此之谓也，”^{[1]2277-2278}在秦昭王即位三年而中外士多去的故事后的评论为：“君子怀才抱艺，孰不愿自见哉？特患遇之非其道，故避去尔。”^{[1]2280}宋濂借助寓言，表达自己对君臣关系的看法，在某种程度上，其文章的字里行间亦传达出入世的想法，文风的转变日益明显。

二、“山林”到“馆阁”：文风转变折射出的文化理想

随着元末政治环境的变化，宋濂文章的关怀主体，逐渐由过多关注个体生活和内心处境，不求用世，而转向某种入世想法的自然流露。元至正二十年（1360）三月，朱元璋遣使来聘，宋濂与青田刘基、丽水叶琛、龙泉章溢同至金陵。自此，宋濂开始了新的人生阶段。对此，宋濂的内心是欣喜的，这在郑楷撰写的《翰林学士承旨、嘉议大夫知制诰、兼修国史、兼太子赞善大夫致仕潜溪先生宋公行状》有所体现。《行状》记载樊观奉书币造门征先生之时，“先生曰：‘昔闻大乱极而真人生，今诚其时矣’”^{[1]2593}。“时”“遇”的不同，导致宋濂的文风也相应地出现变化。宋濂逐渐舍弃往日乐于书写的“山林之体”，转而倡导“台阁之体”，开始肆力于馆阁文章的创作。

（一）宋濂进入金陵后的角色转变与生活轨迹。进入金陵前的宋濂，悠然于山水怡然自乐，对世事似乎兴趣不大。而宋濂进入金陵后，迅速完成了其角色的转变，此时的他，是朱元璋器重的文臣。进入金陵的元至正二十年（1360）七月，担任江南等处儒学提举；十月奉旨入内，授皇太子经；至正二十二年（1362），朱元璋召宋濂与孔克仁讲《春秋左氏传》；至正二十四年（1364），改起居注；至正二十五年（1365）正月，与朱元璋论帝王之学；明洪武二年（1369）二月，宋濂任《元史》纂修总裁，六月除翰林学士、亚中大夫知制诰，兼修国史^②。可以说，至明王朝建立之时，宋濂便在新的环境下完成了自我定位。一位心系大明王朝、渴望开启一代新风的文臣形象，出现在明代士子面前。

宋濂不但有繁重琐碎的政务要处理，而且不时地向朱元璋陈述治国的道理。如元至正二十五

① 据宋濂《龙门子凝道记》整理，见《宋濂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第2238页。

② 据郑楷《翰林学士承旨、嘉议大夫知制诰、兼修国史、兼太子赞善大夫致仕潜溪先生宋公行状》整理，见《宋濂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第2591-2601页。

年(1365)正月,在端门,朱元璋和宋濂谈黄石公《三略》,两人的对话,颇能见出宋濂在朱元璋身边扮演的角色。郑楷对此有详细的记载:“先生进曰:‘《尚书》二《典》三《谟》,帝王大经大法,靡不毕具,愿陛下留意讲明之。’上曰:‘朕非不知《典》、《谟》为治之道,但《三略》乃用兵攻取,时务所先耳。’上问帝王之学何书为要,濂请读真德秀《大学衍义》。上览而悦之,令左右大书揭之两庑之壁,时睇观之。”^{[1]2594}朱元璋和宋濂谈古代帝王宴安则多好神仙,宋濂进言:“汉武好神仙而方士至,梁武好佛而异僧集,皆由人主笃好,故能致之。使移此心,以求贤辅,天下其有不治乎?”^{[1]2595}对此,朱元璋的反应是“深然之”^{[1]2595}。朱元璋祭祀方丘,患心不宁,宋濂劝谏道:“孟轲有言,养心莫善于寡欲。审能行之,心清而身泰矣。”^{[1]2595}朱元璋的反应是“称善久之”^{[1]2595}。自元至正二十年(1360)入金陵到明洪武二年(1369),虽然进金陵的时间不过十年,他在金陵的活动和馆阁文臣的地位,对其文风有着显著的影响,其文章中出现的颂美倾向日益高涨。

(二)宋濂的理想文风与馆阁文章的职能。一代有一代之士道,一代有一代之学风,一代有一代之文风。在金陵生活了十年的宋濂,深感昔日的山林文章,已经无法和明王朝的新兴气象相配。明洪武三年(1370)正月,朱元璋的《赐翰林学士诰文》正式赐予宋濂。在诰文中,朱元璋对宋濂的表现给予较高的评价,同时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期待,即“尔尚夙夜恭勤,务展所孕,使文词通畅,治体昭明,庶副朕简拔之意”^{[1]2525}。宋濂明白展现明王朝的新兴气象,必须有新的文风出现,同时,他也在思考、探索着这种新风气。在很大程度上,这种新文风应当是和宋濂心中的理想文风相契合的。

宋濂曾与弟子郑楷、刘刚、郑柏详细谈说其心中较为的理想文风,集中体现于《文原》中。其心中的理想之文为超越了辞翰的更广泛意义上的文,即“吾之所谓文者,天生之,地载之,圣人宣之,本建则其末治,体著则其用彰,斯所谓乘阴阳之大化,正三纲而齐六纪者也,亘宇宙之始终,类万物而周八极者也。”^{[1]2003}。在此,“正三纲齐六纪”是其心中理想文章的重要功能。对于这样的文章,宋濂认为“圣人得之,则传之万世为经;贤者得之,则放诸四海而准。辅相天地而不过,昭明日月而不忒,调变四时而无愆。”^{[1]2003}反思明初文坛的弊病,即宋濂所说的“世之为文者不为不多,骋新奇者,钩摘隐伏,变更庸常,甚至不可句读,且曰:‘不诘曲聱牙,非古文也。’乐陈腐者,一假场屋委靡之文,纷揉庞杂,略不见端绪,且曰:‘不浅易轻顺,非古文也。’予皆不知其何说”^{[1]2004}。宋濂对时人为文之弊感到悲哀,心中亦有着理想文章的标准和改革文风的愿望,提出“台阁之文”便符合情理。

馆阁文章具有美教化、移风俗的职能。在某种意义上,宋濂之师黄潜对山林草野之文和朝廷台阁之文的论述提供了一定的理论资源^①。朱元璋赐宋濂担任翰林学士的诰文颁发三个月之后的四月二十一日,宋濂便借为中书右丞汪广洋作序之机适时倡导“台阁之文”。他在《〈汪右丞诗集〉序》中说,“昔人之论文者,曰有山林之文,有台阁之文。山林之文,其气枯以槁;台阁之文,其气丽以雄”^{[1]459},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不是才能的差异,而是“所居之地不同,故其发于言辞之或异耳”^{[1]459}。宋濂进一步分析山林之文与台阁之文的差异,“其见于山林者,无非风云月露之形,花木虫鱼之玩,山川原隰之胜而已。然其情也曲以畅,故其音也眇以幽。若夫处台阁则

① 黄潜《贡侍郎文集序》云:“昔之论文者,盖曰:‘文之体有二,有山林草野之文,有朝廷台阁之文。’夫立言者,或据理、或指事、或缘情,无非发于本实,有是实,斯有是文。其所处之地不同,则其为言不得不异。乌有一定之体乎?”见黄潜《金华黄先生文集》卷十九,清同治三年刻本,第7a—7b页。此处,黄潜没有对山林、台阁二体进行评价,而宋濂在拈出二体论文之时则有鲜明的褒贬态度。

不然，览乎城观宫阙之壮，典章文物之懿，甲兵卒乘之雄，华夷会同之盛，所以恢廓其心胸，踔厉其志气者，无不厚也，无不硕也”^{[1]459}。“台阁之文”的重要职能便是宋濂所强调的：“美教化而移风俗”^{[1]460}。宋濂对台阁文章的功能非常看重，专门强调“此有关物则民彝甚大，非止昔人所谓台阁雄丽之作”^{[1]460}，同时在文章的结尾提到，“皇上方垂意礼乐之事，岂不有撰为《雅》、《颂》以为一代之盛典乎？”^{[1]460}他不但自己身体力行，还呼吁大家积极创作此类文章。

（三）宋濂以金陵为中心的馆阁文章书写与政治关怀。《谕中原檄》是宋濂为朱元璋所起草的著名檄文，此文站在儒家正统的立场，开篇便明华夷之辨，从君臣大义和纲教名常出发历数了元朝的暴政，如下：

元之臣子不遵祖训，废坏纲常，有如大德废长立幼，泰定以臣弑君，天历以弟酰兄，至于弟敝兄妻，子烝父妾，上下相习，恬不为怪，其于父子、君臣、夫妇、长幼之伦，渎乱甚矣……及其后嗣沉荒失君臣之道，又加以宰相专权，宪台报怨，有司毒虐，于是人心离叛，天下兵起，使我中国之民，死者肝脑涂地，生者骨肉不相保。虽因人事所致，实天厌其德而弃之之时也。^{[1]70}

导致社会动荡、天下兵起的原因是“天厌其德”，朱元璋此次出兵征讨正是替天行道，为民除害，名正言顺。文章中不仅提到了朱元璋所率之师号令严明，秋毫无犯，正是仁义之师，文章还提出了对蒙古、色目人的安抚政策，即“能知礼义、愿为臣民者，则与中国之人抚若无异”^{[1]71}。这篇文章，辞气和婉，朴实无华，无恫吓之词，显得平易亲切，“民稍安，食稍足，兵稍精”更体现了一代帝王的谦逊姿态。这篇文章有助于安定民心，为朱元璋迅速统一北方奠定了基础。

华夷之辨，是古代中国学术上的重要话题。这关系到政权的合法性的问题。从宣传动员上，《谕中原檄》为朱元璋军队北征奠定了一定的基础。而明王朝建立后，同样面临着正统与变统的问题。虽然朱元璋即位的次月即下令革除胡服，恢复汉人衣冠典章制度，但是仍有大量由元入明的儒士心存故国，依旧奉故元为正统，而无视或者是漠视朱明王朝的存在。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并非是他们完全认可少数民族政权，而是价值取向不同，且心存对故元的忠孝大义，像戴良、杨维桢便是如此。明初学者胡翰、宋濂、方孝孺均对此做出了一定的努力，撰写文章为朱明王朝正名。钱穆先生认为此类文章“在当时则皆为正人心伸大义之正论”^[3]，“否则元居正统，凡为元而死者皆忠臣，凡拒明而不仕者皆义士”^[3]。同时，钱穆先生还指出当时存在的一个最为根本的问题，即“方明之开国，群士大夫则无不心尊元室为正统，抑且无不有故君旧国之思焉，乃莫不谓明祖之登帝位，乃一出于天命，于是一切创制立法，兴礼乐，明教化，选贤择相，与民更始之大政宏纲，乃举无本原可言”^[3]。因此，有必要创作文章论证朱明王朝的合理性。此为宋濂馆阁文章创作的重要原因之一。

除此之外，纂修《元史》对元朝盖棺定论，亦能结束不少眷恋故元文士的幻想。工程告竣，宋濂撰写了《进〈元史〉表》，开篇便提到修《元史》之目的，即“伏以纪一代以为书，史法相沿于迁、固，考前王之成宪，周家有鉴于夏、殷，盖因已往之废兴，堪作将来之法戒”^{[1]46}，文章论述了元朝的盛衰兴亡缘由，为明朝治理国家提供借鉴。不仅要结束士子对蒙元的眷恋之情，还要探索明代的文学规范和学术典范。《元史》不设“文苑”传，而是把前代修史采用的“儒林”“文苑”合为“儒学传”，就很能见出官方的修史态度，即强化经术而淡化文学。叶晔《明代中央文官制度与文学》认为，树立虞集作为馆阁文学模式的代表，强化与官方意识形态相契合的文学形态，注入馆阁文学体系之中，有助于实现道统与文统的合一，初步塑造明代官方文学形象，构

建官方文学体系^[4]。此正为开创明代学术体系的重要途径,以别于元代。

进入金陵后,宋濂游览了金陵的众多名胜古迹,见到名山古刹,或者亭台楼阁,就作文赋诗,抒发心中所感,表达心中的政治理想。《阅江楼记》是宋濂奉命所写的应制之作,属于典型的馆阁之文。此文借金陵山水风物抒发怀抱,对帝王进行讽谏,语淡意深,气象阔大,饶有情趣。文章先从金陵的帝王之气写起,六朝至南唐,偏居一隅,无法与此地王气相配,惟有明王朝“始足以当之”。次写阅江楼之位置,进而设想皇帝登楼,“必悠然而动遐想”,见到“中夏之广”,定会“益思有以保之”;看到“四陲之远”,必然“益思有以柔之”;看见“万方之民”,必然“益思有以安之”,“保之”“柔之”“安之”写出了仁慈爱民的一代明君形象,足以垂范后世。作者由眼前之美景,思接千古,想到了历史上的临春、齐云诸阁楼,尽管盛极一时,而瞬息之间,令人不禁“感慨系之”,兴亡之感,油然而生。最后,行文至“斯楼之建”,则笔峰一转,引出修建阅江楼之初衷为“寓其致治之思”,而帝王登览此楼,心中所想的应是国家社稷和天下百姓,以此委婉表达对帝王的讽谏。从这篇游记可以看出,宋濂十分重视文学的教化功用,尤其是在政治上的教化作用。在宋濂看来,文辞与政治是相通的,不管是“祠祝”“诏令”“册命”,还是“誓戒”“章疏”“铭颂”“诗骚”都是有着强烈的政治功用的目的,即“文辞与政化相为流通,上而朝廷,下而臣庶,皆资之以达务。是故祭饗郊庙,则有祠祝。播告寰宇,则有诏令。胙土分茅,则有册命。陈师鞠旅,则有誓戒。谏诤请陈,则有章疏,纪功耀德,则有铭颂。吟咏鼓舞,则有诗骚”^{[1]685}。而当时读书人多“求文于竹帛间”,埋首故纸堆,宋濂则与他们不同,大力提倡文学的教化功用,希望能够通过文学来规正风俗,有裨风教。

谈到这里,不得不说宋濂参与制定的一些文化政策。洪武初年(1368),朝廷不断强化文学为政教服务的功能。洪武六年(1373),由朝廷亲自出面改革文风,下令禁止作对偶文辞。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云:“九月庚戌,诏禁对偶文辞,命翰林院儒臣择唐、宋名儒笺表可为法者。群臣以柳宗元《代韩公绰谢表》及韩愈《贺雨表》进,令中书省颁为式。”^[5]改革文风,是为革除元末文坛纤弱繁缛之弊端。仅仅改变文风,讲究实用的文学,恐怕还不行。欲鸣一代之盛,还需要强化主流思想。宋濂在洪武七年(1374)纂辑《皇明宝训》等,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朱元璋的治国思想,并要求天下士子恪守相关准则。谈迁《国榷》言:“五月,丙寅朔,《大明日历》成。自上起兵至洪武六年事备载,百卷,藏金匱。学士宋濂等又辑圣政,分四十则。自敬天至制蛮夷,曰《皇明宝训》,五卷,刊示天下。”^[6]宋濂在创作中亦是主动、自觉地践行朝廷所宣扬的理念。这在其写给后学或朋友的赠序文章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代表性的有《送许时用还越中序》《赠会稽韩伯时序》《赠梁建中序》等。《送许时用还越中序》则典型地表达了宋濂作为文学侍从之臣对皇帝的感佩之情。许时用与宋濂为同乡,宋濂自二十岁起便对他极为仰慕,渴望见上一面,四十年里有五次想要见面,却始终未能如愿。四十年后,他们在离家千里之外的南京不期而遇,还没有来得及促膝长谈,美好时光便结束了。金陵既是让人欣喜的相聚之地,亦是令人伤感的分别之城。许时用来去匆匆,宋濂心中的感情如泉水般不择地而涌出,在感慨人事之后,宋濂突然笔锋一转,对当今圣上进行歌颂和赞美,“虽然,时用之归也,其有系于名节甚大……诚由遭逢有道之朝,故得以上沾滂沛之恩,而适夫出处之宜也。夫道宣上德,以昭布于四方者,史臣之事,因不辞而为之书,区区聚散之故,一己之私尔,则又当在所不计也”^{[1]463}。这类文章,文风朴实而美政之风明显。

在金陵奉命所作的传状文,亦是宋濂馆阁文章创作的重要方面。宋濂名贯四海,“元勋巨卿碑记刻石之辞,咸以委濂”^[7],宋濂亦乐于为之,代表性的有为常遇春撰的《大明勅赐银青荣禄

大夫上柱国中书平章军国重事兼太子少保鄂国常公赠翊运推诚宣德靖远功臣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太保中书右丞追封开平王谥忠武神道碑铭》（后文简称为《开平王神道碑铭》）、为犯有过错的淮安侯华云龙撰写的《敕赐开国辅运推诚宣力武臣荣禄大夫柱国淮安侯华君神道碑铭》等。常遇春是朱元璋非常欣赏的一位将领，为大明的开疆拓土做出巨大贡献。遇春死后，朱元璋亲自为其选择地点营建栖灵之所，并嘱托宋濂写墓志铭。在《开平王神道碑铭》中，宋濂历数其赫赫战功，尤其是对遇春的品德和谋略极尽赞美之辞：

王之为人，守谦而不矜，有功而无过，运筹决胜之方不学而能，其从大将军东征西伐，则能遵守节制。及其自将兵，则所至无不克捷，由其智识明而材力雄，故施之各得其宜。呜呼，若王者可谓开国之殊功勋者矣。^{[1]1209}

赞美遇春，一方面是为了表现其对明朝开国所作出的贡献，另一方面是为了突出朱元璋的知人善任。良将遇到明主，方能人尽其才，实现自己的价值。绍述完遇春的功绩之后，宋濂话锋一转，谈朱元璋、常遇春二人的“君臣相遇”，把朱元璋比作唐太宗，把常遇春比为辅成唐业的尉迟恭，足见宋濂的良史之才。宋濂在最后感慨道：“今王之功，非恭所可及，上之所以遇王者，封谥与之虽同，而其王爵之加，恩数优渥，揆之于唐，诚又过之。史臣所谓君臣相遇，千载一时者，岂不异世而同符也哉？是宜铭诸贞石，传之千万世，一以昭圣天子垂念功臣如此之至，一以著王之勳烈于不朽云尔。”^{[1]1210}与开平王常遇春相比，淮安侯华云龙则是犯有过错的开国将领，宋濂则采用春秋笔法为其书写墓志铭，形象地勾勒了他的一生。云龙屡次违反朱元璋法令，朱元璋均予以宽免其罪行。宋濂在其墓志铭中写道：

然而封以大郡，锡之侯爵，宠恩之加，不为不重矣。奈何……徇欲败度，绝无忧国恤民之心。乃知往古韩、彭之流，怙功自专，卒至夷灭，皆其自取焉尔。所赖圣天子推天覆地载之量，保全功臣，唯恐有毫发不至，故侯得令终于家，享荣名歿世，岂非幸欤……于是勅葬以侯礼，聊示薄罚，可谓仁之至，义之尽者也。臣濂奉勅撰神道之碑，稽诸天理之正，察乎人心之公，不敢用昔人志墓常法，特取《春秋》直笔褒贬之义，勒文穹碑，以为千万世人臣劝戒云。^{[1]1254}

云龙是居功自傲、怠政违法的典型将领，朱元璋并没有与之斤斤计较，而是展现了一代帝王的宽宏大量，并妥善安置了善后事宜。可谓对功臣的关怀、照顾无微不至。云龙所犯的过错，恰恰从反面烘托了朱元璋的人格魅力。这是别具一格的颂圣文章，令宋濂之才华发挥到极致。同时，宋濂并没有止于批评云龙，也没有一味地赞扬朱元璋，而是表达了更深一层的思考，即功臣最初能够做到遵纪守法，听从号令，尽心尽力为朝廷办事，而一旦拥有高官厚禄，却“志盈气骄，唯欲之是从，遂致坏接乱政，盖有其初而鲜克有终”^{[1]1252}。宋濂的史识，于此可见一斑。这绝非危言耸听，而是植根于现实所作的深思。宋濂所作这篇文章的日期为洪武七年（1374），而之后的事情则正如宋濂所忧虑的那样，接连发生功臣谋反之事，不能不赞叹宋濂的先见之明。

值得一提的是来自朱元璋的礼遇，让宋濂对朱元璋成为一代明君充满期待^[8]。他在所作的《同知临洮府事班景道除陕西行省参知政事诰》《遥授李思齐江西行省左丞诰》《给事中安统除兵部尚书诰》《侍御史王居仁除山西行省参知政事诰》等诏书中，宋濂均代朱元璋表达了明朝的开国气象、勤政爱民的决心和君臣一心治理好天下的愿望。

元亡明兴之际，文化需要重建，朱元璋、宋濂等明朝上层统治者和学者选择了理学作为治理国家的规范和准则。元代纲常混乱，金陵在历史上长期是短命王朝的首都，无疑给身居金陵的上层知识分子提供了较好的反思之地。大明定鼎金陵，需要重新建构属于自己的价值体系。这便直

接影响到知识分子的士道、学风及文风。宋濂在自己的馆阁之文中,详细地谈了自己对国家法度、世道人心的认识,并身体力行,参与制定了明初的国家规范与礼仪制度,以建立明代的学统和道统。应该说,宋濂对台阁之体的倡导,还是得到了朱元璋的肯定和明初士子较广泛的响应。

三、宋濂对台阁文风的倡扬及其影响

宋濂进入金陵后所做的礼乐文化制度建设方面的工作,以及对台阁文风的提倡、鼓扬,得到了朱元璋的肯定。明洪武五年(1372)朱元璋赐宋濂太子赞善大夫的诰文中,有“承事郎、礼部主事宋濂,尔以纯谨之资,老成之学,执笔柱下,视草词林,继司业乎胄监,复考礼于仪曹,皆称其职”^{[1]2526};在明洪武九年(1376),朱元璋赐宋濂翰林承旨的诰文中,明确提到宋濂“虽才不兼文武,博通经史,文理幽深,可以黼黻肇造之规,宜堪承旨,弘敷明文,壮朕兴王”^{[1]2527}。帝王的认可,加上宋濂作为天下文臣之首的地位,其所倡导的台阁文风很快在明初文坛形成一股潮流,产生较大的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一代明文的走向。

(一) 宋濂弟子的响应与创作实践。宋濂弟子众多,著名的有方孝孺、王绅、郑渊、郑济、郑楷、郑洧、郑柏、郑干、郑格、郑棠、楼璉、楼希仁、刘刚、赵友同、李端、吴彦诚、章存厚、林静、黄昶等。宋濂鼓扬台阁体于上,宋门弟子则积极响应。

王绅创作了十二首《拟大明铙歌鼓吹曲》,对朱元璋的文治武功极尽讴歌与赞美。正如《拟大明铙歌鼓吹曲》序中所说:

臣幸生明时,获际雍熙之治,世职儒业……伏覩太祖皇帝手提三尺,取胡元,平僭乱,以肇造区夏,所以雪近代之耻,功诚不在汤武下,可无所述以见咏歌、被音乐乎?爰取汉魏以来所载铙歌鼓吹词仿其体为十二篇,用纪丰功伟烈,曰:大明铙歌鼓吹曲。以上虽其言芜陋,不足铺张万一,或者命将出师时用之军旅行阵间亦可以知祖宗缔造之艰难与佐命元勋之劳烈。^{[9]1a}

王绅在序中把为文的意图已经交代得十分明白,在创作中亦是按照朱元璋的崛起分“元季乱极四海,兵兴,太祖皇起淮泗平僭乱、正大统为神龙跃”“蛮子海牙以舟师扼采石,王师与战,克之为殪奔鲸”“元将据建业,天兵击之,为开洪武基”等十二部分予以叙述,极尽描写之能事,展现了朱元璋的过人谋略与赫赫战功,如《元社既屋,苗裔犹存,大兵再加,穷极北漠而胡遂平,为荡胡穴第十》云:

元氏有天下,腥羶遍中原。辨发裂冠冕,士效啞嚅言。圣人受天命,远续皇王传。手提三尺剑,起自淮泗堧。削平诸僭乱,胡遂竄燕然。屏迹虽甚邈,天讨不可延。穷追及沙漠,巢穴无复全。卓哉创业勋,上雪唐宋冤。^{[9]3a}

在王绅的笔下,一位雄才大略的帝王展现在人们的面前。非但王绅创作此类文章,宋濂的另一位高足刘刚(字养浩)亦考订朱元璋的征伐而作《铙歌》十二篇,较之王绅,在当时的影响亦较广。胡翰《刘养浩铙歌鼓吹曲后跋》云:“今刚此歌篇次体制皆承子厚之旧,而才气横发、音节铿锵,则得之潜溪,又将追步其武,而駸駸其前矣”^{[10]21a},“洸洸乎如在短箫铙鼓间,不知其为衰飒也”^{[10]21b},点出了刘刚的师法渊源,且对刘刚所作铙歌进行肯定和赞赏。

方孝孺是宋濂文风的重要继承者,亦是其众多弟子中影响最大的一位。对于宋濂开创的“雍容浑穆”的台阁文风,四库馆臣云:“方孝孺受业于宋濂,努力继之。”^{[11]1464}方孝孺洪武年间创作了《灵芝甘露论》《凝命神宝颂》《蜀道易》《四月一日蒙赐宴浣花新建草堂感恩怀古偶作》《休日

奉陪蜀府诸公宴集》等。《蜀道易》云：

方今况有贤圣君，大开学馆论典坟，坐令政化希华勋。征贤一诏到岩穴，咄尔四方之士，孰不争先而骏奔！王道有通塞，蜀道无古今。至险不在山与水，只在国政并人心……今逢天子圣，贤王之德世所钦。文教洽飞动，风俗无邪淫。孱夫弱妇怀千金，悍吏熟视不敢侵。蜀道之易谅在此，咄尔四方来者，不惮山高江水深。^[12]

在此诗中，方孝孺热情地歌颂了朱元璋和蜀献王的贤明仁德，让蜀道不再是艰险通塞。建文年间，方孝孺被征召入京师，馆阁文章也创作得更多，影响更大，如《大明故开国辅运推诚宣力武臣特进光禄大夫左都督左柱国议军国事信国公追谥襄武封东瓯王神道碑铭》。

（二）宋濂开“台阁体派”先声，为明代文章的演进奠定基础，影响着一代明文的走向。宋濂的文坛领袖地位和突出的文学创作成就——“道德文章，师表当世”^{[1]2591}——无形中影响着天下士子的习学宗尚。王兆云《词林人物考》云：“远方来者，授馆而饮食之，久而不衰”^{[1]2581}，生动地记载了宋濂对天下士子的影响。

明代首次开科取士便于洪武四年（1371）隆重举行，主考官便是宋濂等人，取中的士子中有吴伯宗等。吴伯宗的《荣进集》里保存着大量的应制诗，其诗文“皆雍容典雅，有开国之规模，明一代台阁之体胚胎于此”^{[11]477}。此种风格，正是宋濂所大力倡导的。两人同在馆阁，吴伯宗的创作是宋濂倡导的台阁之体的最好注脚。宋濂去世后，方孝孺光大宋濂之学。建文二年（1400），方孝孺主持京师的会试，此次会试取中的士子便有后来被称为台阁体派代表的胡广、杨溥、杨荣等人，其文风雅正，可以说是符合方孝孺心中的预期的。而方孝孺的文风对永乐年间的重要文臣解缙有着一定的影响^①。建文时代，杨士奇等人与孝孺一起编纂《太祖实录》《类要》等书，孝孺皆为总裁，馆阁文人之间互相切磋、交流对于文章、学术的看法，亦在常理之中。值得注意的是，此类典籍所传达的观念，正是官方意志的体现。杨士奇等人不可能不受到影响。

宋濂晚年所创作的馆阁文章，对明初“台阁体”的形成具有不可轻忽的作用。作为一代文臣之首，宋濂提倡台阁之体，正是着眼于朱明王朝的文治之兴。黄宗羲《〈明文案〉序（上）》云：“有明之文，莫盛于国初，再盛于嘉靖，三盛于崇祯。”^{[13]17}在黄宗羲看来，明文最盛的时期为明初。“有明文章正宗，盖未尝一日而亡也。自宋、方以后，东里、春雨继之，一时庙堂之上，皆质有其文。”^{[13]19}黄宗羲在《〈明文案〉序》中以极简省的笔墨向世人勾勒了明代三百年古文的发展脉络，孝孺在明文演进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不可或缺，同时明确地指出杨士奇（号东里）等人对宋濂、方孝孺所开创的文学传统的承继，使得庙堂之上“皆质有其文”。此处的承传关系，应引起重视。正如有学者论述：“宋濂的文学主张奠定了后世台阁体的理论基础和价值取向，‘三杨’等人台阁体创作的内容和风格基本上未超出宋濂的这些规范。”^[14]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宋濂所创作的馆阁文章对一代明文的影响，还体现在：后人追溯有明一代文章正宗之时，多把宋濂视为一代明文的奠基人。如明遗民归庄《简堂集序》云：“吾朝文章，自金华两公^②开一代风气，上与唐宋诸大家匹。”^[15]清人薛熙《明文在·凡例》梳理了一代明文诸大家的传承关系：“前明大家如宋潜溪、方正学、苏平仲、杨东里、王阳明、唐荆川、归震川诸公，心法相传……真得《左》《国》《史》《汉》之神理，所以为正派。”^③于此，可以看出宋濂在开创一代新风中的

① 钱基博先生更是敏锐地发现解缙的《白李善长冤》等文章，“俱明白剀切，有孝孺之风”。见钱基博《中国文学史》，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8年，第687页。

② 此处的金华两公指宋濂、王祿。

③ 薛熙《明文在·凡例》，清康熙三十二年古谿水园刻本，第1a页。

作用。另外,《明文在》所选的一百卷约计诗文两千余篇,“虽系前明一代之文,必与本朝著作鸿篇有相关者始得登选”^①,可以看出宋濂的馆阁文章对清代文风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同时,薛熙在为《明文在》所作的序中也谈到宋濂之文对一代明文的影响:“明初之文之盛,潜溪开其始;明季之文之乱,亦潜溪成其终。盖潜溪之集不一体,有俊永之文,有平淡之文,有塗泽之文。洪、永以及正、嘉朝之诸公善学潜溪者得其俊永而间以平淡,此明文之所以盛也;隆、万以及启、祯朝之诸公,不善学潜溪者得其塗泽而间以平淡,此明文之所以乱也。”^②另外,有必要指出的是,宋濂在文章中寄托的政治关怀,亦是经历元末社会大动乱的众多知识分子对朱明新兴王朝的期望,具有不容轻忽的文化意义。

参考文献:

- [1] 宋濂. 宋濂全集 [M]. 黄灵庚, 校点.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4.
- [2] 王祯. 王忠文集 [M] //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第 1226 册.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 [3] 钱穆. 读明初开国诸臣诗文集 [J]. 新亚学报, 1964 (2): 243-326.
- [4] 叶晔. 明代中央文官制度与文学 [M].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1: 42-45.
- [5] 谷应泰. 明史纪事本末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7: 210.
- [6] 谈迁. 国榷 [M]. 张宗祥, 校点. 北京: 中华书局, 1958: 502.
- [7] 张廷玉. 明史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3787.
- [8] 陈博涵. 期待的落差与角色的错位——论仕明前后宋濂心态的变化 [J]. 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2010 (3): 42-46.
- [9] 王绅. 继志斋集: 卷上 [M]. 清同治三年刻本.
- [10] 胡翰. 胡仲子集: 卷八 [M]. 清同治十二年刻本.
- [11] 永瑤. 四库全书总目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5.
- [12] 方孝孺. 方孝孺集 [M].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13: 925-926.
- [13] 黄宗羲. 黄宗羲全集: 第十册 [M].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3.
- [14] 许建中, 李玉亭. 宋濂与台阁体 [J]. 浙江社会科学, 2008 (2): 111-115.
- [15] 归庄. 归庄集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4: 217.

The Writings and Political Concerns in Song Lian's Later Years —On Song Lian's Guange Proses after Entering Jinling

Zhu Guangming

Abstract: Song Lian was a famous prose writer in the Ming Dynasty, and he was hailed as “the head of civilian officials during the founding period of the country” by Zhu Yuanzhang. His works enjoyed the pioneering and leading position in the literature of the Ming Dynasty and also were significant in the history of ancient style prose in the Yuan and Ming Dynasty. In the period of transition from the Yuan to the Ming Dynasty, there were frequent changes of regime and instability in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Song Lian tried to seek opportunities to achieve Confucian ideals. The Ming Dynasty established its capital in Jinling, and Song Lian was highly regarded by Zhu Yuanzhang. The history and culture of Jinling was massive, and Song Lian was influenced by the temple culture, then he wrote a lot of Guange proses about the scenery of Jinling and the system

① 薛熙《明文在·凡例》, 清康熙三十二年古绿水园刻本, 第 1a 页。

② 同① 1a—1b。

construction of the Ming Dynasty. When Song Lian lived in Jinling, his style of writing transformed from Shanlin to Guange style gradually. This transformation reflected his political and cultural ideals of constructing the authentic literature in the Ming Dynasty. Altogether, Song Lian's Guange literature presented the characters of paying equal attention to literary and Dao, and expressed the emperor's hope to achieve the ideal of benevolent political concerns. Further more, Song Lian's Guange proses initiated the officialese style of the Ming Dynasty and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the evolution of proses in the Ming Dynasty.

Key words: Song Lian; political concerns; writings; Jinling

(收稿日期：2016-10-14；责任编辑：陈鸿)

【上接第 49 页】

参考文献：

- [1] 吴晓波, 杨发明. 绿色技术的创新与扩散 [J]. 科研管理, 1996, 17 (10): 38-41.
- [2] 聂洪光. 生态创新理论研究现状与前景展望 [J]. 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2, 14 (3): 126-132.
- [3] 杨发庭. 绿色技术创新的制度研究——基于生态文明的视角 [D].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 2014.
- [4] 衡孝庆, 魏星梅. 科技创新平台政策环境评价研究 [J]. 中国高校科技, 2011 (6): 17-18.

The Index System and Its Measurement of Green Technology System Fusion

Heng Xiaoqing, Li Haoyuan, Zou Chengxiao

Abstract: Green technology system fusion is the key link of green technology application.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its characterization of green technology system fusion, it sets up a relative index system and carries out practical measurement by scientific methods to truly understand the development of green technology so as to take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to solve problems of green technology practices and better promote green technology development.

Key words: green technology; fusion; index system; measurement

(收稿日期：2016-09-12；责任编辑：沈秀)